

|| 专 题 史 系 列 丛 书 ||



中国东南佛教史

严耀中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专 题 史 系 列 丛 书 |

中国东南佛教史

严耀中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东南佛教史/严耀中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专题史系列丛书)

ISBN 7-208-05658-7

I. 中... II. 严... III. 佛教史-中国

IV. 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2203 号

责任编辑 虞信棠

封面装帧 王晓阳

·专题史系列丛书·

中国东南佛教史

严耀中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5 插页 6 字数 326,000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50

ISBN 7-208-05658-7/K · 1120

定价 31.00 元

出版说明

在浩如烟海的史学著作中,专题史著作是专门性强而主题面广的一类学术研究专著。这类著作,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领域的某一专题为研究对象,在广征博引文献典籍和考古发现及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钩沉稽玄、探幽发微、考镜源流、传承文明,力求翔实而又清晰地展现这些领域滥觞、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在加深对“通史”和“断代史”等相关领域的阐述方面,起着其他论著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上海人民出版社致力于专题史著作的出版。自20世纪50年代迄今,先后出版了长期从事专题史研究的专家、学者撰著的《中国货币史》、《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中国印刷史》、《中国天文学史》、《中华文化史》、《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国舞蹈发展史》、《中国杂技史》、《中国小学史》等一大批专题著作,受到海内外学界和广大史学爱好者的欢迎和好评。

为了满足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需要,我社决定组织出版“专题史系列丛书”,并从历年已出版的数百种专题史著作中遴选出一批学术价值较高、出版时间较长的图书,汇入“专题史系列丛书”,分批出版,以飨读者。

本丛书出版前,在编辑工作中,或由作者对原书作了必要的校订,或由编者对原书插图作了相应的技术处理。特予以说明。

作者简介



严耀中 1947年8月生,浙江慈城人,1982年上海师范学院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94—1996年间为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宗教研究系及多伦多大学(Univ. Of Toronto)宗教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哲学及古典文献专业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副院长,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及中国佛教史。专著有《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吉林教育1990)、《中国宗教与生存哲学》(学林1991)、《汉传密教》(学林1999)、《江南佛教史》(上海人民2000)等,另发表《麴氏高昌王国寺院研究》,《论六朝的神通禅》,《敦煌文书中的“平等大王”和唐宋间的均平思潮》,《传统文化中的卜筮与儒家》等论文七十余篇,总共二百余万字。

导语：东南与江南

承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好意，将拙著《江南佛教史》列入“专题史系列丛书”予以出版，为此仅在个别字句上做了一番校订，不作其他改动。不过由于该系列丛书皆冠以“中国”之名，而若称“中国江南佛教史”则书名略嫌重累，因江南固已为中国特有的地域概念。所以编者建议将书名更改为《中国东南佛教史》。鉴于中国的“东南”与本书中划定的江南范围在习惯指称上十分接近，两个地理概念时有重叠之处，可以通用，故亦不失为一权宜之计。

历来“东南”是一个通用性很大的方位地域概念。秦统一中国后，以中国的范围内说东南，则往往和江南的一些概念相近，在一定程度上两者是可以通用的。因为我在《江南佛教史》中所使用的“江南”概念，在其不同的指称里是一种偏中的用法，即“基本范围是浙、赣、闽三省以及苏南、皖南，淮南的缘江部分也可算在内”。而秦汉以降的“东南”地域，也大致与此相合。如“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1〕。秦始皇巡游的线路是：“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2〕。这些地方此后都可以说与本书的江南概念中的范围非常相近。

〔1〕《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隋唐之前扬州作为行政区域对联系江南和东南这两个地域名称十分重要。《汉书·地理志》以“东南曰扬州，其山曰会稽，藪曰具区，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其利金、锡、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鸟兽，谷宜稻”。又《史记·吴王濞列传》中亦以“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的谶语预示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三国时也以扬州等同于东南地域，如曹操“谓（刘）馥可任以东南之事，遂表为扬州刺史”〔1〕。《晋书·地理志上》则同样以“东南曰扬州”。唐初“武德三年，于县置扬州，乃置东南道行台”〔2〕，可见二者的治区是重合的。

而在本书第一章中多次引证，江南也指称扬州，后来在长期的习惯意识中“江南扬州的概念根深蒂固”〔3〕。汉顺帝时“扬州统会稽、丹杨、吴、豫章、九江、庐江六郡”，东吴时“扬州统丹杨、吴、会稽、吴兴、新都、东阳、临海、建安、豫章、鄱阳、临川、安成、庐陵南部十四郡”〔4〕。这些地方既可称江南，也可目为“东南”〔5〕，如《古今图书集成·坤舆典》卷四十四“舆图部汇考二”之“东南曰扬州”条云：“殷人以淮入徐，故扬州止谓之江南”，二者通过扬州而等同。《旧唐书·李孝恭传》云“江南悉平”后，因他参与征讨，故“授东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后废行台，拜扬州大都督”。表明在唐人的观念中，江南、东南、扬州三个地域观念之间仍存在着有机联系。

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期间，也有以东南直指江南的。《三国志》卷六十三《赵达传》云其“谓东南有王者气，可以避难，故脱身渡江”。这里的“江”即是长江，赵达去的地方是建业，所以已经将东南蕴指江

〔1〕《三国志》卷十五《刘馥传》。

〔2〕《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三》。

〔3〕周振鹤：《释江南》，载《随无涯之旅》，三联书店1996年版。

〔4〕《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

〔5〕如南齐时有谶语“旅布六郡东南隅”，见《南齐书》卷十八《祥瑞志》。这六郡即是扬州属下会稽等六郡。

南。《隋书·长孙览传》云其“开皇二年，将有事于江南，征为东南道行军元帅”，及《旧唐书·李靖传》云“江南悉平，于是置东南道行台”等，也包含着这样意味。

宋代的“东南”区域概念，并不很确定，但仍接受着前代观念的影响。如宋仁宗时，“议者谓东南虽无事，不宜弛备。嘉祐四年，乃诏荆南江宁府，扬、卢、洪、潭、福、越州募就粮军，号威果，各营于本州。……于是东南稍有备焉”〔1〕。这里所谓东南的一府七州正是《江南佛教史》里面的江南范围。元代以降，随着行省作为行政区划日益强化，江南不复以行政单位代表东南，但一方面前制的烙印不易消除，如元代的“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也是对唐代“扬州东南道行台尚书省”的承袭，它先设于扬州，“寻徙杭州，又徙江州。（至正）二十三年，迁于建康，以监临东南诸省，统制各道宪司，而总诸内台”〔2〕。而明代亦“东南被倭，南畿、浙、闽多额外提编，江南至四十万”〔3〕。又《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九七“松江府部汇考九”之“夏周祠”条云：“周文襄忱巡抚江南最久，有功于东南”。以及清咸丰十年八月诏：“江南提督张国樑谋勇兼优，忠义奋发。在军十年，战功卓著，东南半壁，倚为长城”〔4〕等等，可见“东南”、“江南”两词能通用的现象纵贯二千年间。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江南在经济、文化、社会习俗等领域愈来愈成为东南的代表，如明代王畿讲学，“足迹遍东南，吴、楚、闽、越皆有讲舍”〔5〕，其“吴、楚、闽、越”，正是王畿“足迹遍东南”的写照，也基本符合当时人心目中“江南”的范围。因此可以说历史上在

〔1〕《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同书卷一九六《兵志十》云神宗时“以三千人散戍东南杭、扬、江宁诸州，以备盗贼”。表示有关东南范围的这种概念有很大的连续性。

〔2〕分见《元史》卷六十二《地理志五》、卷八十六《百官志二》。

〔3〕《明史》卷七十八《食货志二》。

〔4〕《清史稿》卷二十《文宗纪》。

〔5〕《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

东南和江南两个地域概念间,长期存在着相当的互相替代可行性。如明代蔡懋德在其《请浚吴松江疏略》把“江南水患”与“今军兴需餉,仰给东南”相连^{〔1〕}。再如《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輿地要区”云:“自古以来,西北以强胜而多失之乱,东南以治隆而多失之弱,此则风俗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人直其失也狠,东南之人诈其得也易,故自古以来西北之政多以严致平,江南之政多以宽为治,此则人民之各有得失也”。又本书第二章里说“徐淮地区邻近江南,在汉时它与江南同属扬州,是中国佛教最早滋生地之一,也是向江南输出佛教的主要地方”。这徐淮地区也可以包含在“东南”的地域概念中,使佛教的区域性似乎显得更完整些。所以至少是如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江南方輿纪要序》中所言:“以东南之形胜而能与天下相权衡者,江南而已”,即江南为中国东南精华之所在,举江南则能得东南,说东南当然也能包揽江南。

还应该说明的是,虽然“东南”和“江南”两个地域概念之间的关系总有些差异,甚至这两个概念本身在漫长的岁月中也有变迁,这可能对诸如户口、税赋统计来说很重要,但对宗教形态这样的文化现象来说并不十分紧要。因为《江南佛教史》并不拘泥于寺院与僧侣的个体数量出入,它在叙说一个大地域内的佛教本身流派的演变,以及它与社会政治、文化习俗之间的种种互相关系时,大地域的边际范围的稍稍变动,并不会对讨论这些演变与互相关系带来太大影响,无论以江南称之还是以东南称之,该地区的佛教特征也仍是同一回事。所以觉得本书顺应“丛书”要求,将《江南佛教史》易名为《中国东南佛教史》,还是说得通的。于是作此说明,期望读者的理解。

本书还由姚潇鹤先生等帮助做了索引,特此表示感谢,并希望由此能对读者带来方便。

〔1〕 文载《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二七八。

何兹全先生序

《江南佛教史》即将付印。作者严耀中同志和我的学生陈琳国、谢重光是好朋友，他们经常互相切磋，因此他跟我在八十年代初就认识了。耀中一向虚心好学，每次赴京都来看我，这次持稿请我作序，我自然是乐意写的。

我一向认为宗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僧侣世界和世俗世界一样，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这一时代的社会经济面貌、特性，有时在僧侣世界表现得比世俗世界更为清楚。因此，对一个时代的宗教进行深入的研究，对我们研究、认识这一整个时代的社会是极其重要的。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逐步融入中国社会，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要研究中国的历史，离开这一部分是不行的。遗憾的是，近半个世纪来我国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甚至一些外国学者的成果在数量上比我们还多。最近几年来，我们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开始对佛教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包括行将出版的《江南佛教史》。这是个好现象，应该受到欢迎。

在中国存在了约二千年的佛教，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它本身在时间长河中也经历了种种演变，呈现出千姿万态，所

以这里面有很多的领域和专题可供我们研究。《江南佛教史》是一部对宗教形态和区域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考察的专著,对中国这样一个疆域广大、文化内涵丰富的国家来说,其宗教表现出一定的地区特征是很必然的,问题是这些特征由何产生?它们形成以后又反过来怎样影响地方社会的?对此,以前较少有论著提及,故《江南佛教史》可以说是在这方面起了一定的开拓作用。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类似的著作涌现,使我们的佛教研究更为深入,更有声势。

看了《江南佛教史》初稿后,我有两个较深的印象。一是这部著述不单是引用了大量的原始史料,还采用了相当多现代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出处。二是这部著述从体裁到内容多有创新。学术是一种文化积累,每一代学者都应当是对别人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发扬,因此我们在自己进行研究时必须充分了解和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我很高兴看到《江南佛教史》能和其他新近出版的一些学术著作一样,做到了这两者的结合。这说明新一代的研究工作者已经恢复了我国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并愈来愈接近通行的国际学术规范。

我自己过去曾对中国古代的寺院经济和佛教形态做过一些研究,很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把这些研究继续下去,并开创新的领域。随着社会的发展繁荣和不断进步,包括学术研究在内的文化事业必定会有更大的发展。

对此我颇有感慨,是为序。

秦家懿先生序

严耀中先生在 1994 年来加拿大访问两所大学，并乘此机会埋头苦修，为《江南佛教史》作了专门性的研究。如今书将付梓，又诚意嘱我写序，这对我来说是很荣幸的事，只是我因旅行的关系，至此才能脱稿，颇有遗憾。

佛教早就传入中国，其后又影响深远。江南地区在唐代后，更成为文化盛地，士民思想较开放，允许佛教各宗的输入与立根，其中禅宗与净土宗的流传是学界已较熟悉的，但是密宗较少得到专家的注意，它的源流与影响，也少记载，所以《江南佛教史》在畅述净土、天台与禅宗之余，尤其详述密宗的流入与演变（第九章），实是学界之幸。

《江南佛教史》给了我多种启示，我得悉天台、净土与禅各宗之间的交流（第十二章）；我也领悟到有关密宗与道教之间的互相影响。我记得曾与已过的英籍印度教权威 A. L. Basham 交谈，他当时提出道教有可能影响过印度教密宗的构想。本书指出现存密经中包含的道教术语与诵文多种，作者又强调密宗善于吸收新东西，并在江南形成多姿的地方色彩。这在中国其他地区也有特别反映，诸如川密、长安密与江南密都有所不同，作者也将它宗中流传不息的佛学称为“寓宗”，表示江南密宗类似净土宗，但又与天台、禅宗结合。

本书也不忽略佛教深入江南民间的影响，并多处举例以证，述说

咒语密术在南宋期间的流行与运用。作者也引宋儒朱熹“释氏论下”中所指的“结坛诵咒二十五轮之类，以至大力金刚、吉盘茶鬼之属”以旁证当时密宗之盛。

《江南佛教史》是严耀中先生集国内外资料写成的。作者的学风严密，在加拿大是人所称道的。本书涉猎很广，除中文资料之外也有英文与日文的参考书。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发行，也是中国学界的盛事。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特级讲座教授 秦家懿

1998年7月10日于多伦多

前 言

像中国这样一个疆域广袤的国家，既然自古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而存在着不同特征的区域文化，诸如三秦文化、川蜀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等等，而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至少也有近二千年了，漫长的岁月使它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么作为文化的一部分，理应也有着它的区域性。但长久以来，中国佛教的区域性没有被很好地研究过。“文革”结束后，随着学术研究的复苏，近几年也出现了一些按省区分叙的佛教史著作。可是我认为，尽管这些著作中有的内容丰富，写得很好，但行省的建立毕竟是元代起才有的事，那时中国佛教已经过了它的形成期和鼎盛期，因此关于地域对中国佛教影响的探索，不应该被现行的行政省区所束缚。这就是我开始研究区域佛教史时的初衷，也是为什么我要在第一章首先探讨江南区域特点的原因所在。

在导致佛教进入江南的诸多地域因素中，江南尚鬼好祀的民俗，率先流行的道教成了其在汉末进入该地区的最早接引点。然而更重要的是，佛教和随着司马氏政权南渡的玄学的结合，以及伴随着的高僧和名士的合流，这使得佛教有机会被士大夫阶层所了解接受，从而有可能和中华文化实现真正的融合，并在日后成为它的传统的一部分。这是从地域上来说当是江南对中国佛教最重要的贡献，因为在

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阶层的观念主宰着社会的统治意识,一种外来文化如果没有被士大夫所接受,就不可能在中国社会站住脚跟,这也是其他进入过中土的宗教文化没有,而只是佛教成功了的原因所在。

另一方面,佛教与玄学在江南的结合也对当地的佛教产生长远的影响。由谈玄而谈佛,从而谈出了江南佛教重义理的特性来,般若、涅槃诸学,三论、天台诸宗在江南的兴起,无不与此有关。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三点是应该特别注意的,一是大乘空宗和有宗的观念在议论争鸣之中,得到了融合;二是在这个基础上和儒、道等中国传统思想有了非常好的交流机会,其中最重要的是佛性说和中国传统神灵观念通过与范缜无神说的论战中有机结合而自圆其说,这也促使三教合一的呼声在江南发出最强音;三是这种结合使得士族高门纷纷转向崇信佛教,东晋南朝时佛教因此空前繁荣,并在梁、陈两朝达到了准国教的地位。我还认为,梁朝灭亡不能归咎于武帝崇佛。

江南佛教还贯穿着另外一条主线,那就是佛教神通性的突出。早在汉末东吴之交,安世高、康僧会、支谦等已经将小乘禅和密经传入江南,它们在尚鬼好祀等习俗的影响下,先是经过宝志等僧的身体力行形成了神通禅,后来又助长了密教在江南的流传。江南的神通禅还是禅宗公案形成的一个原因。这中间所含神秘主义因素,是作为宗教所不可或缺的,读者在阅看所引史料时,当然会明白这一点。同时,佛教的发展也碰到了反佛的阻力。对佛教的发难来自其利益或观念受到佛教发达碰撞的利益集团和佛教自身所滋生的弊病两个方面。在中国,前者需要政治上的调节,后者则主要靠加强戒律。所以伴随着反佛,江南佛教却发展出不少新特点,如一是江左律学以奉《十诵律》为主,隋唐以后则以《四分》为主;二是戒与禅的

普遍结合；三是江南佛教首先将持戒与断酒肉素食联系在一起；此外还促成了忏与忏法的流行；这些都使佛教戒律对中国社会起着更为广泛的影响。

由于作为消费性的事业，宗教有赖于经济的发展而繁荣，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会对宗教的繁荣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一方面因为寺庙堂观的建设，传教及法事活动的举行，都需要财物充裕的支持。另一方面，人们在温饱之余对精神关怀的需要，并不亚于其在困苦挣扎之时，所以宗教虽都说是为了拯救苦难，但也老往着安定繁荣的地方跑。这在江南佛教史上有过两次，一次是在魏晋南北朝，另一次则在五代两宋经济重心南移之间，后者涉及华严、唯识、净土诸宗在江南的兴盛。

宗教的形态和功能是在同整个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的时候才会被充分显示出来的，所以要较好地描绘出佛教在历史上的区域形态，就必须把佛教与当地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联系起来看，本书自十三章起主要就是在这些方面进行探讨，如江南寺庙的社会功能和寺院经济，佛教如何融入民间，与淫祠杂神等地方崇拜相处，和僧侣参与政治，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佛教自身的异化等等，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本书也是一本描写佛教思想及其形态与江南地域各种关系的佛教社会史。

从全书的框架上说，我是以江南的自然人文背景的不同方面来阐释佛教在此地所发生的种种变化，而正是这些变化导致了有特色的所谓江南佛教的产生，所以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是围绕着这些主题写的。然而这样的写法便不同于一般的佛教史了，因为本书的每一章都围绕着一个主题来叙说，虽然论题的排列基本上按年代的

次序,但为了讲清主题来龙去脉就必须瞻前顾后,大大超越主题所侧重的时代。这有点像史学中的所谓纪事本末体。对撰写中国佛教史的体裁来说,恐怕算是一种新的尝试,似乎这种方式更能反映出江南的佛教形态及其演变过程。如此形式的系统工作迄今为止在佛教史研究中还是很少有人做过的,如果这本书会有什么参考价值的话,我想那是最主要的。

一本书从立题下笔到出版,往往是一条漫长曲折的路,其中有欢悦也有艰辛,可谓一言难尽。但有些事必须一说,因为这些情况对本书的写成有很大的影响,藉此也向关心支持本书写作的师友们表示谢意。从1992年起我开始着手准备江南佛教史的课题,不久该课题被列入上海市“八五”社科重点项目,得到了七千元钱的资助,当时来说这笔钱还是很可观的。1993年的工作主要是积累资料,可是到了年底,我获得了去加拿大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撰写本书的准备工作只能放到次要的地位。1996年回国忙碌了一阵子后,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于1996年中正式动笔,历时一年又九个月后终于完成了本书初稿的写作。何兹全、秦家懿两位先生还为本书作了序,这是对作者莫大的鼓励,也使本书由此生辉。书稿在1998年春交出版社后,在等待审稿及完成各项手续过程的同时,我撰写了另一部书稿《汉传密教》,由于所接触的材料的方向是相同的,因此随时据所见有关江南佛教的史实,对本稿进行了一些小的修改补充,目的是但愿奉献在读者眼前的本书有较多一些的心得创见和较少一些的错误。